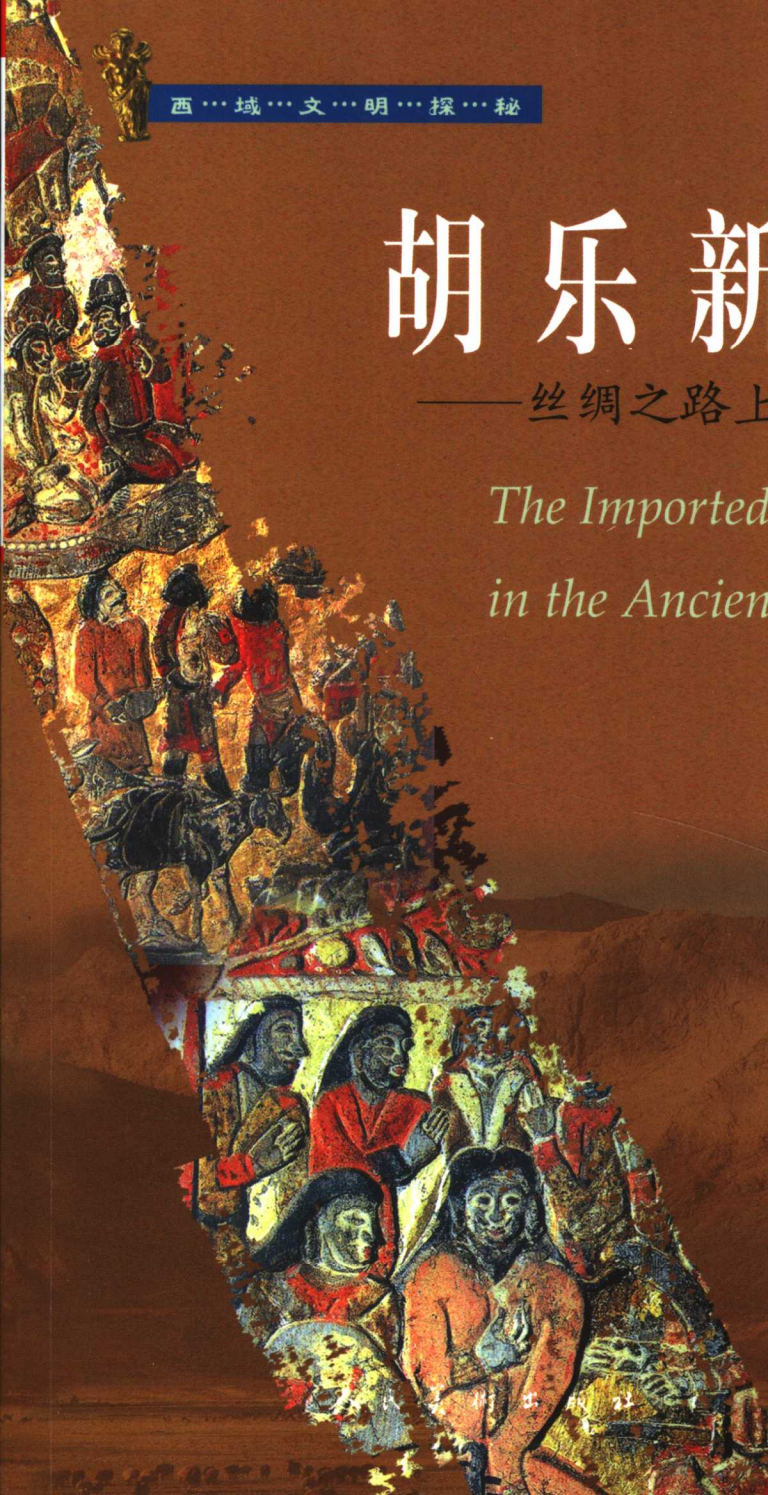




西…域…文…明…探…秘

陈 凌
陈奕玲

著

胡乐新声

——丝绸之路上的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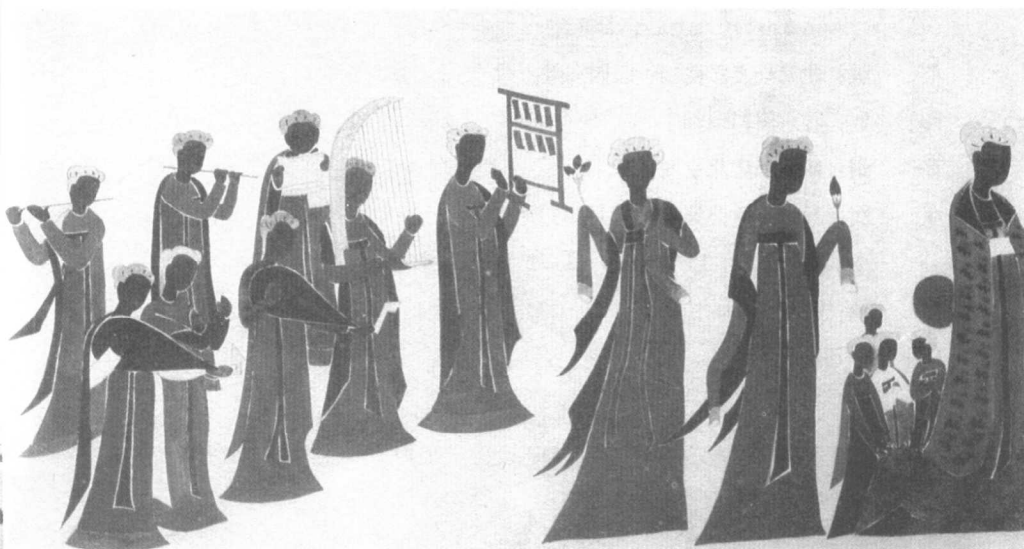
*The Imported Music
in the Ancient China*

The Imported
Music in the
Ancient China

胡 乐 新 声

——丝绸之路上的音乐

陈 凌 陈奕玲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乐新声——丝绸之路上的音乐 / 陈凌、陈奕玲著.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12

(西域文明探秘 / 余太山主编)

ISBN 7-102-03216-1

I. 胡… II. ①陈… ②陈… III. 乐器—文化交流—中国、外国 IV. J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8218 号

胡乐新声——丝绸之路上的音乐

陈凌、陈奕玲 著

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

(邮编 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制 版: 北京燕泰彩视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4.25

印 数: 0001—3000 册

ISBN 7-102-03216-1

定 价: 25.00 元

前言

“西域”是古代中国人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其核心则是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西域一度位于古代东西方交通的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连接百国千城，肩负着送往迎来的重任。形式各异的民间和官方商贸、朝贡活动，使地中海文明与东亚、南亚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由于北方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不时纵横驰骋，南下牧马，草原文明也随着金戈铁骑涌入这里。西域于是成了古典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多元文明的荟萃融合，使之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独特风貌。

西域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民族的多元性、语言的多样性，使西域研究涉及历史、考古、语言、民族、民俗、艺术、宗教、哲学、文学以及人类学、遗传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诸多领域，成为一门难度很高的综合性学科。正因为具备殷实充足的内涵，拥有神秘奇美的色彩，艰辛痛苦的探索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令人目不暇接的惊喜，使西域研究反而充满牵魂动魄的巨大魅力，吸引了大批学者甘为之衣带渐宽，九死不悔。这套丛书就是这样的一些学者奉献给广大读者的。

季羨林先生多次说过：“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交流给古老的文明注入新鲜的血液，使之常新长盛，生生不息。交流满足了人类好奇的天性。人类的好奇心将永远跨越千山万水，对遥不可及的彼岸倾心向往，研寻不已。

西域研究就像是为人类好奇心打开的一扇门。通过这扇门，我们可以窥见古代的中国人经过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去了解关外的奇异世界；大秦、黎轩、波斯、粟特的使团、商队则穿过浩瀚的沙漠纷至沓来，让古代中国为西方世界所认知；东与西的交流因之而成为可能。

可以说，西域研究开凿了一条时空隧道，让我们能够沿之前往寻觅、触摸几千年来从未间断的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轨迹。

我们希望本丛书能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研究者和读者一起感受西域历史文化的绮丽壮美，分享上下求索、神游千年的快乐。通过这窗口，象牙塔内的工作更广泛地为广大读者所了解。同时，我们也热切盼望感受 and 了解使更多有兴趣的朋友投身到西域研究中来。

余太山

2004年5月21日

目 录

前言	1
引子	1
施之金石越于声	4
风流渐逝奈若何——礼乐制度的确立与蜕变（上）	16
乐书沦亡，寻案无所——礼乐制度的确立与蜕变（下）	30
繁手淫声争新怨	44
伎进胡音务胡乐	60
胡部新声锦筵坐	72
胡风夜夜吹边月	79
弹出天鹅避海青——琵琶	93
昆山玉碎凤凰叫	103
主要参考文献	112
图版	113

引子

这本小书也许有点儿文不对题了。

照理题目叫“胡乐新声”，就该一门心思写传自于西域的音乐，不该意有旁骛的，可却花了不少的笔墨说中国的事情。这岂不是有“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之嫌？

诚然，写东西是该文题相应的。不过，在写有关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音乐时，我们总是觉得有些东西似乎就隔着那么一层说不清楚。于是，要么就按很通常的写法，讲讲带有胡味、胡风的音乐文化也就交差应付了；要么就得换个角度，说点儿别的什么，捅一捅那层窗户纸。想来想去，觉得倘若不是不负责任地瞎写，改个写法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于是，我们还是花些工夫说一说隔着的那点儿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显然，问题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说明白的。因此，这种伸手出脚的作法，看起来就胆儿太大、心太野了，算不得正宗作派，只能是旁门左道。

“文化”这东西说起来可就难了，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最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卑者无甚高论，我们还是识相点儿，不打算在这里发表



什么样的高见来添乱添堵，就只讲点儿离题不远的事儿。

人人生活在本土的环境里，总觉得一切事情、一切作法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并不觉得别扭。这种感觉好比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而换个文化，换个地方，也许就不那么顺眼，不那么自在了。这种感受，一无例外，每个人都会有，不管他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还是高大得不能再高大的圣人。其实，这无非是文化在作祟。文化如同一张大网，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得经过这张网的筛选。文化网格认为“好”的东西，就可以透得过这张网的筛选；认为“坏”的，一概摒除，格杀勿论了。不同的文化，网格自然有所不同，筛选的标尺也就不一样。各个不同的文化，在各自圈子里，不妨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中国的文化自然也有自己的网格。只不过，什么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就不太容易说了。我们只能暂时以史前时代在中国中心地区之内的文化及其派生的“种类”当成中国本土的文化。中国文化的网格里，礼乐制度具有至高至上的重要性。或者是先王，或者是先圣，或者是历代的统治阶级，无不把礼乐当做最重要的教化手段。传说是孔圣人参与订立的中国古代文化规则，华夷之辨又是其中头等大事之一。古代中国人从骨子里认定自己的文化具有不容置疑的优越性。孔圣人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私下里的潜台词不就是“诸夏”最好嘛！那么我们就禁要问，为什么这样一个既把礼乐教化视为本文化攸关生死大事的国度，又是一个对自己文化有极大信心的礼仪之邦，却会把“夷狄”的音乐文化放进“礼乐制度”中呢？这岂不是有“夷狄滑夏”的嫌疑吗？这些夷狄的东西是怎么“走私”来的呢？为什么它们没有被中国文化的网格所筛除？用一句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来回答，恐怕不免过于空泛且有狗皮膏药之嫌了。

我们的解释是，中国文化的网格本身出现了问题，或者说是文化的格

局发生了变化，才是发生大泄漏的内因。这种变化，大致以战国和三国魏晋时期为烈，到了隋唐时代达到了一个高潮。西域的音乐“乘虚而入”，倒不是洋货一定香，国产的就土，人家在这方面确有比中国土产高明的地方。

实际上，域外音乐的输入还只是中国文化网格变化趋势的一面而已。另一方面，我们还常常能看到，被士大夫所不屑的俚俗谣曲，往往也能进入“高级”的音乐组合中。我们相信夷狄之乐的输出，最先肯定也是从民间市井途径辗转而来的。人们在过去听到或者能看到的往往是“精英”、“高雅”的文化向社会下层的灌输。而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了另一种反向的运动——低层文化向社会上层的浸润。这可算是个很有趣的事了！借用后现代式的说法，这也算是对精英主体历史的一种解构。其实，历史上类似的趣事还有不少，只不过没人去注意罢了。

既然着眼点在于此，我们这本小书主要就对这样的趋势做一些勾勒，哪怕这种勾勒是多么粗线条，至少也称得上是一种尝试吧。不消说，其中的错误和不当自然是在所难免的了，祈盼诸位读者不吝赐教为幸！



施之金石越于声

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徒听其铿锵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礼记·月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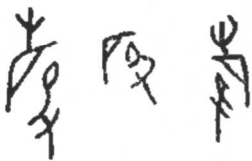
说起哪些乐器是从域外传入中国之前，先得知道中国本土范围内原来有些什么乐器。根据种种有关上古音乐的传说，鼓、钟、磬、埙等等，大概算得上中国最早的乐器了。大致成书于西汉的《尔雅》是中国的第一部字典。据《尔雅》卷五《释乐》所记，至少有琴、瑟、鼓、磬、钟、笙、篪、埙、箫、管、簫等等诸类乐器。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材料，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些乐器是舶来品，因此我们不妨把它们称为中国本土乐器。相比于这些中国本土乐器，后世传入中国的各种西域或印度乐器，无不让人在

第一眼就感受到其散发出的异域情调。而20世纪初以来出土的本土乐器，则让我们深深地领略了其间蕴含的中国气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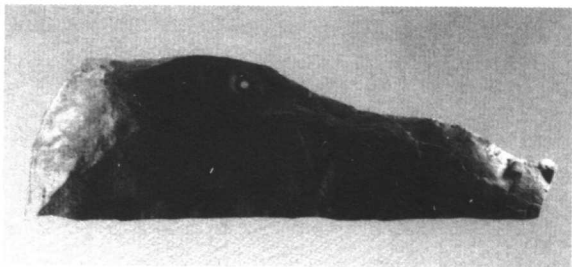
磬 由于是石制的打击乐器，因此在远古时代，人们也称磬为“石”或“鸣球”。把几个磬编成一组，以打击出不同音高来，称“离磬”。在甲骨文里，磬字就好像一个人手持槌击打悬挂着的石磬。

目前出土的主要是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磬，大多都属于龙山文化时代，从外形上主要有直背磬、折背磬、弧背磬和倨背磬四种不同的样式。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早期遗址的甲种大墓里出土了一件直背石磬，与之同出的器物还有鼗鼓。该件石磬是利用天然黑色角页岩片打制而成，表面粗糙不平，有明显的酥点和破裂面。整件石磬厚薄不均，股部相对较厚而鼓部则较薄。股上边和鼓上边连成一直线，股端略凸而鼓端微凹，底边略平。在偏向股部的一侧上部有一长圆形的悬孔，孔中有明显的绳索磨痕，从而可知这是件使用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乐器。这件石磬悬挂起来之后，重心下移成 60° 倾角，稳定性较好，打击时发出的声音短促而浑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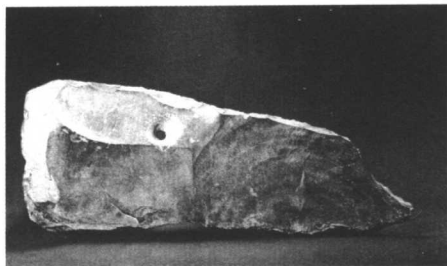
青海乐都县柳湾墓地中属于齐家文化早期的1103号木棺墓（约公元前2000年前后）里，除了出土有绿松石饰件、双大耳罐、双耳彩陶罐等等遗物之外，还出土一件石磬。这件石磬一端已残，略呈三角形，穿单孔，系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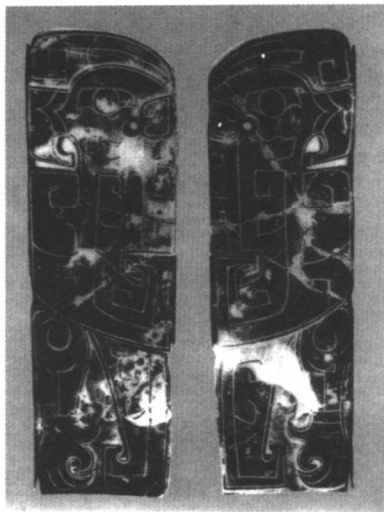
甲骨文中的“磬”字



山西襄汾陶寺出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直背石磬



山西夏县东下冯出土的夏代石磬



河南安阳殷墟所出商代鴟鵂纹石磬

砂岩，灰黑色，制造不甚精致，器形较大，长42.4厘米、宽4.5~18厘米、厚2.2厘米，敲之有声。这件石磬是柳湾墓地新发现之一，也可能是我国迄今已知的年代较早的一件石磬，为研究我国古代乐器史提供了一件重要的实物标本。

在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里，也发现了一件石磬。东下冯类型的二里头文化，现在学术界比较主流的看法认为就是上古三代之一的夏。这件石磬的出土，则让我们得窥夏人精神世界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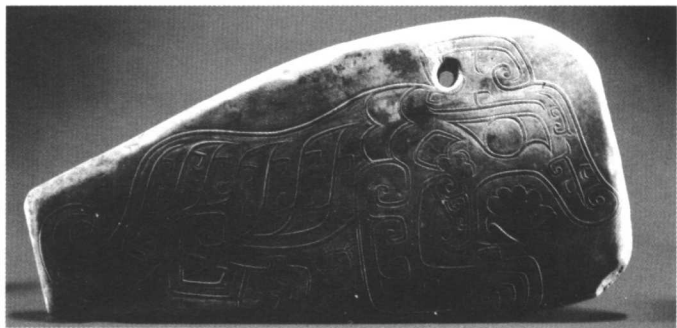
如果说东下冯出土的夏代石磬还比较粗糙未尽精美的话，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石磬则不得不令人对其工艺之精湛叹服不已。安阳殷墟所出鴟鵂纹石磬，扁平长方形，磬石黑色，一端呈弧形，长25.6厘米、宽6.7~8厘米，磬面雕有鴟鵂形纹饰，鴟鵂作站立状，钩喙大眼，短冠短翅，长尾向内卷曲，爪刚健有力，雕刻十分精美。试想一下，在那距今三千多年的上古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已经可以达到如此高的境界，是何等可观！

安阳武官村商代晚期墓葬出土一件大理石制作的虎纹石磬，长84厘米、

河南安阳殷墟
武官村大墓



河南安阳殷墟
武官村大墓出
土商代晚期虎
纹石磬



高42厘米。纹饰是雄健威猛的虎纹，磬体磨平，制作精美，上方有供悬挂用的圆孔。此磬出土时，在墓椁室西侧有24具殉葬的女性骨架，随葬品中还有两个可作舞具用的小铜戈。因此这些殉葬者可能就是乐奴。发现同样石磬的商代遗迹并不只一处。《诗经·商颂》描述殷人祭祀乐舞“鞀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说明磬在商代是一种重要乐器。出土的商代石磬悬孔上侧的磨痕，以及磬面的敲击痕迹，表明它们都使用过很长一段时间。磬主要用于统治者宗庙祭祀和朝聘宴享等重大的仪礼活动。它和钟既是乐器也是礼器，是统治者权力和地位的一种象征。



钟 据《吕氏春秋·古乐篇》、《礼记·明堂位》、《山海经·海内经》等书记载，钟是由垂或鼓延所作。这说明钟的历史相当早。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两件钟形乐器，分别是陕西省庄和河南三门峡庙底沟出土的陶钟。客省庄出土的陶钟呈长方形，上体安有实心的直柄。

《孟子·尽心下》有一段故事：

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孟子曰：“何以言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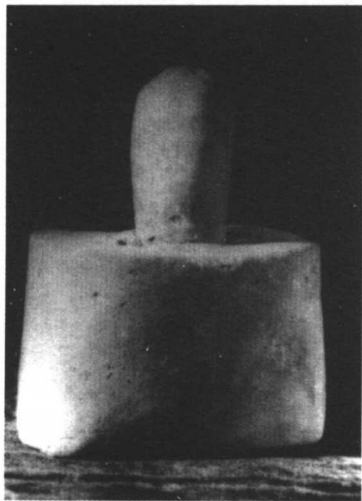
“以追蠹。”

“追”就是钟的钮。“蠹”原意是指一种能吃木头的虫子，这里形容钟钮像被虫子咬了一般。这个故事用白话翻译过来就是，高子对孟子讲：“大禹的乐声比文王的乐声好。”孟子问他有什么根据这么说。高子回答：“因为使用大禹钟的人显然更多，所以钟钮已经被磨损得像被虫子咬过一样。”通过这则对话，我们知道战国时代的人还可以见到夏禹时候的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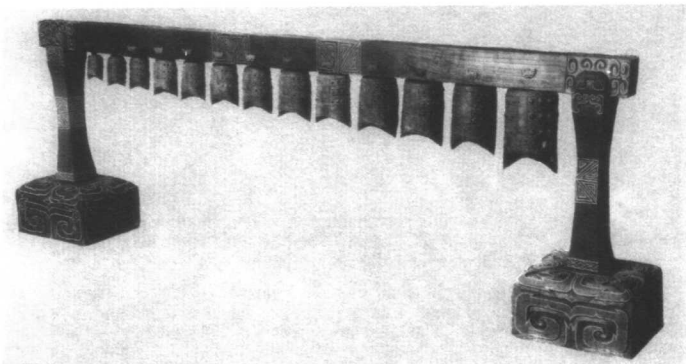
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编钟13件，其音高可构成完整的十二律

半音音阶，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制品。同墓还出土了此套编钟的钟架(残)，揭示了古代钮钟的悬挂方法。

1978年，湖北随县西北3公里擂鼓墩曾侯乙墓被发掘。这是一座保存异常完好的战国早期大墓。曾侯乙墓规模之宏大，出土文物数量之多、制作之精，震惊海内外。墓中所出各种铜器大多铸有“曾侯乙”的铭文。其中大型铜镈的铭文与宋代安陆所出“曾侯钟”完全相同，系楚惠王在其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制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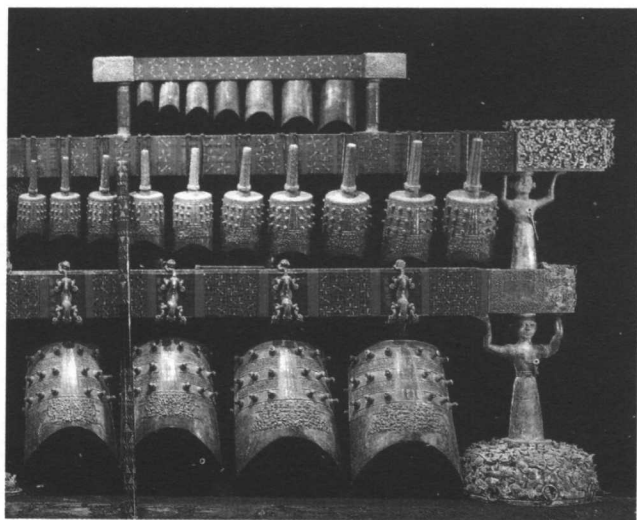
陕西客省庄出土陶钟



河南信阳长
台关楚墓出
土编钟

“曾侯乙宗彝”。这就表明，该墓的年代在此年或稍晚。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其工艺之精良令人叹为观止。除此之外，墓中出土的大批乐器，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发现，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古代音乐文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曾侯乙的棺槨在东室，室内有殉葬的女性青少年8人。此室乐器有十弦琴、五弦琴、瑟、笙、小鼓等，可组成一个小型的丝竹乐队。殉葬者可能是演奏这些乐器或表演歌舞的女乐人。中室有墓主举行盛大宴乐场面所用的乐队，即“钟鼓”乐队的乐器，如编钟、编磬、建鼓、排箫、笛、笙、鼓、瑟等。西室又有殉葬的女性青少年13人，这些人可能也是表演乐舞的奴隶。

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极为壮观：铜木结构的曲尺形钟架，全长10米以上，上下3层，通高2.73米，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木承托。钟架悬挂的65件编钟总重量达到3500公斤。编磬为铜质磬架，长2.15米、高1.09米，由两只鹤状怪禽支撑，上下两层悬挂四组32件石磬。编钟、钟架、编磬、磬匣都刻有字数不等的铭文。编钟上的铭文详细记载了该钟所属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以及曾国和楚国、晋国等地律名的对应关系。现代的测音完全证实了这些编钟音律的精确。人们在震服于编钟、编磬的宏大场面



曾侯乙墓出土编钟
(局部)

之余，不得不由衷地惊叹中国古代对音律认识的深刻与成就之辉煌。

鼓 关于鼓有种种传说，《世本》的记载认为黄帝之子“夷作鼓”。而《吕氏春秋》则说帝誉臣“倕作为鞀鼓”。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鼓在中国出现的时代确实相当早。《礼记·明堂位》说：“土鼓，蕢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有的学者认为，这种鼓是用草扎成的鼓槌敲击的。《周礼·春官·籥章》言：“掌土鼓豳籥。”郑玄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为框，以革为两面，可击之。”由此可以窥见原始土鼓的形制。《礼记·明堂位》又说：“夏后氏之鼓足。”夏后氏有一种鼓是带足的。又相传，在黄帝时期，人们在讨伐蚩尤的战争中曾九战不胜，后受神示，建造了八十面“夔牛鼓”，在隆隆的鼓声中，军士们士气大振，最终擒杀了蚩尤。

《诗经·小雅·彤弓》：

彤弓召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飧之。

彤弓召兮，受言载之。我有嘉宾，中心喜之。钟鼓既设，一朝右之。

彤弓召兮，受言橐之。我有嘉宾，中心好之。钟鼓既设，一朝酬之。

又如《采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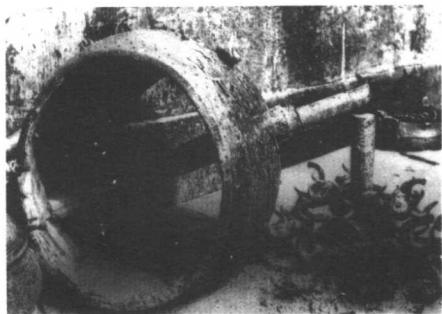
鴝彼飞隼，其飞戾天。亦集爰止，方叔莅止。

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鉦人伐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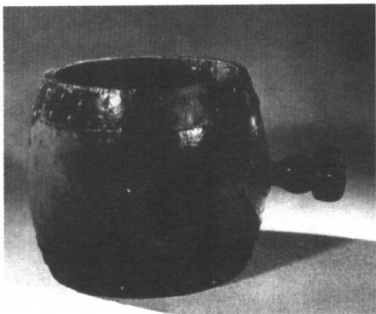
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阗阗。

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不仅有宴乐的场合使用的鼓，同时还有战争中鼓舞士气用的鼓。《左传》记载，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齐国伐鲁国，平民曹刿认为“肉食者鄙”，于是向鲁庄公自荐从征。长勺之战，鲁国大败齐国。战场上曹刿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一鼓作气”的成语典故就出自这里。

由于鼓多是木、革结构，容易腐朽，很难长久保存，所以特别早的鼓发现得很少。曾侯乙墓出土过一面带柄的小鼓和一面建鼓。建鼓，《礼记·明堂位》：“殷楹鼓。”注曰：“楹，贯之以柱也。”《国语·吴语》：“载常建鼓，挟经秉枹。”韦昭注：“建，谓为楹而树之。”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件建鼓鼓身長1米，鼓面径0.8米。鼓框木质、鼓面皮质(已朽)，鼓身穿托在一根木杆上，木杆插入青铜鼓座中心的铜管内。建鼓鼓座，高0.5米，底径0.8米，为青铜铸造，由数十条龙互相纠结盘绕组成，其中有十六条大龙对称缠绕，



曾侯乙墓出土建鼓



曾侯乙墓出土带柄小鼓